



论非市场均衡

□ 王东京

让我先解释概念：非市场均衡是相对于市场均衡的一种状态。读者知道，市场均衡是指在价格机制作用下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市场得以出清；所谓“非市场均衡”，指供求也保持平衡，但这种平衡不是由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而是政府调节的结果。用一句话概括：非市场均衡是供求由政府调节形成的均衡。

我作此文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人类经济活动为何存在非市场均衡或者怎样看待非市场均衡？二是哪些产品供求需要政府调节，非市场均衡与市场均衡如何分工？要把这两个问题说清楚，我认为从分析“自然平衡”与“非自然平衡”入手会更容易理解。事实上，“非市场均衡”与“非自然平衡”道理相若，明白了后者，也就理解了前者。

说远一点，从自然秩序研究人类行为，先行者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00多年，他在《政治学》和《伦理学》等著作中就利用自然秩序分析政治与伦理；中国的老子也是这方面的高人，提出“道法自然”就是强调人类行为要遵从自然法则；但若从经济学看，用自然秩序推出经济均衡的学者，则是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

何为自然平衡？通俗地讲，符合自然秩序（自然法则）的状态即为自然平衡。若读者觉得此定义过于抽象，我不妨用“水平规律”来解释。现在有两个相互连通的湖泊，两者的

水位怎样平衡？有两种可能：若两湖水位相同，根据“水平规律”水会保持静止，不会流动；若两湖水位不同，水会从水位高的湖泊流向水位低的湖泊。这是说，水流动或不流动皆符合自然法则，故为自然平衡。

那么何为非自然平衡呢？非自然平衡是指通过人类干预达到的平衡。还是以水为例。某地有一河流，水位西高东低，按照水平规律，水会自西向东流动。可现在有人在河上修筑大坝建水库，水不再向东流动了，这种状态是否是平衡状态？我们说，这种情况并未改变水平规律，由于修筑了大坝，现在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不过这种平衡不是自然平衡，是非自然平衡。

解释了自然平衡与非自然平衡，回头再说市场均衡与非市场均衡。在某种意义上，市场均衡与自然平衡类似，共同点是两者都不存在外力干预。在分析水平规律时我说，两个湖泊的水位是通过水流动或不流动保持平衡。在商品市场上，“价格”就好比是湖中之水，供求也通过价格涨跌保持均衡。此点好理解，读者只要懂得“价格如水”，也就懂得了市场均衡。

难以理解的是“非市场均衡”。说过了，非市场均衡是政府调节供求形成的均衡。要追问的是：供求本可以由价格涨跌达到均衡，政府为何要出面调节？想来想去，我认为也可从非自然平衡中找到启示。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一路经云南、四川、湖

南、湖北、江西等省市流入大海。此乃自然规律，可人们为何要在沿岸修筑大堤呢？答案是，若不修筑大堤，涨水季节会泛滥成灾。

这就是了，政府调节供求就如同修筑大堤，目的也是为了趋利避害。举个真实的例子。2008年汶川地震后食品严重短缺，当时有商贩将食品卖成了天价。按市场规律，食品涨价无可厚非，可灾民却因买不起昂贵的食品而怨声四起。逼不得已，所以政府要打击那些囤积居奇的商贩，同时又从各地紧急调拨食品增加供给。想问读者，你觉得政府当时这样处理有何不妥吗？

或许有人说地震是特殊情况，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应调节供求。我不同意这看法。请读者再看一个例子。早些年国内房贷不足，加上炒房者推波助澜，市场一度形成涨价预期，而涨价预期又带动更多人炒房，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金融脱实向虚，面对这一局面政府怎能不调控？其实今天房价回落，正是政府限制炒房的效果。

由此可见，非市场均衡的存在是因为某些产品由市场均衡有负作用，政府调节是要弥补市场均衡的缺陷。那么到底有哪些产品供求需要政府调节呢？在我看来有三类：第一类是事关国家安全的产品，如国防军工以及核心技术产品等；第二类是事关社会公正（或社会稳定）的产品，如地震时期的食品、服装等生活必需品；第三类是公共品与公共服务，如消费没

有排他性的公共设施。

以上是从产品类别看。再往深处想，非市场均衡之所以存在，归根到底是它与市场均衡比，其交易成本相对低，不然供求是用不着政府调节的。其实，本文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即非市场均衡与市场均衡如何分工，关键也决定于交易成本。为何说交易成本是决定两种均衡分工的关键？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对计划与市场的边界作过分析，相信读者都看过，恕我不重复。

这里我要特别提点的是，政府调节供求可形成非市场均衡，并不等于政府可以改变供求规律。供求规律只能利用，不可能改变。就像人类可利用“水平规律”蓄水发电，但却改变不了水平规律。同理，政府调节市场也只能利用供求规律，不可能改变供求规律。引申到政策层面，含义是政府若不希望某商品价格过高，可取之策是增加供给，而非限制价格。

归纳本文有两个要点：第一，供求均衡存在两种形态，市场均衡是通过价格机制作用实现的均衡，非市场均衡是通过政府调节供求达到的均衡；第二，两种均衡形态分工的边界决定于交易成本，这是说，只有当市场均衡的交易成本过高时，政府才可以调节供求，形成非市场均衡。



建立和实施，完善省域内调剂机制。第二，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深入推动二三产业和农业的融合，大力拓展持续性提升行业平均利润率的新领域。第三，积极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努力获取规模收益，持续提高种养业平均利润率。

促进产业及人口的适度集中，探索产业兴旺新载体。应该看到，除种植业、林业外，农业各门类中有相当部分对土地内生需求并不非常强烈。同时，当前农村居住过于分散，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成本呈几何级数增加，也不利于二三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发展。因此，促进产业及人口适度集中，成为产业兴旺的必要条件。对此，应通过积极发展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为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等创造出新发展模式。

培育产业兴旺的人才队伍。乡村振兴需要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流入。在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越过60%的新时期，要推动人口在“城镇化”和“逆城镇化”之间协调流动，必须全面改善农民的社会保障条件，扭转农民在收入分配、市场经济权利获取等的不利地位，让农业成为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让农民成为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从而培育出产业兴旺的人才。



建立和实施，完善省域内调剂机制。第二，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深入推动二三产业和农业的融合，大力拓展持续性提升行业平均利润率的新领域。第三，积极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努力获取规模收益，持续提高种养业平均利润率。

促进产业及人口的适度集中，探索产业兴旺新载体。应该看到，除种植业、林业外，农业各门类中有相当部分对土地内生需求并不非常强烈。同时，当前农村居住过于分散，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成本呈几何级数增加，也不利于二三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发展。因此，促进产业及人口适度集中，成为产业兴旺的必要条件。对此，应通过积极发展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为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等创造出新发展模式。

(毛 强)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要解决三大不平衡问题

□ 郭桂萍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其中，加快形成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从政策层面考察，要突出产业集约化、技术标准化、管理规范化的政策导向；从市场运行层面考察，要加强源头控制，实施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质量监管体系。从我国指标体系现存的不足考察，需要解决三大不平衡问题。

解决效益指标体系与质量指标体系建设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为效益指标体系建设日臻完善，但质量指标体系建设有待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应该是全方位的，既涵盖助推三次产业发展的效益指标，又涵盖助推生态、人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事业发展的质量指标。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三次产业蓬勃发展。农业发展逐步走向集约化、机械化和产业化；工业发展逐步走向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现代服务业发展逐步走向人性化、便利化、休闲化。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日臻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日臻完备的产业体系质量认证标准。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进一步提升产业标准体系，进一步提高农、工、商内部供给质量标准体系。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高质量发展必定涵盖人们对生态、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事业发展的新要求。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是我国未来30年发展的主攻方向。因此，一切不利于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都不是高质量发展。不能增加有效就业机会、缺乏民主参与管理公共事务、收入分配差距未控制在合理范围以及不顾资源耗竭和人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很难说是经济发展，更谈不上高质量发展。因此，建立既要效益又考察质量的指标体系是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要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必然选择。

完善公共事业指标体系要从四个方面着力：一要加强区域协同发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杜绝落后产能向落后地区的转移。二要强化生态绿色发展，杜绝质量标准就低不就高的现象。三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避免散、小、荒、乱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四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科技人才队伍，弘扬工匠精神提高科学技术的贡献率。

解决指标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但指标体系建设难以跟上。相较于日新月异的经济新业态的发展，我国指标体系标准还不高，指标体系不够健全，标准修订不够及时，指标体系建设还未及时跟上。因此，供给质量指标体系建设必须应发展而动，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随着科技的进步、需求的变化而及时加以修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因此，标准是质量的尺子，助推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目前，我国行业质量标准的平均标龄为10年，制定周期为4年多，滞后的标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质量的提升。

如何才能建立科学高效的高质量指标体系呢？由于现实需求的多维性、复杂性，影响产业、行业、部门产品和服务质量指标体系的因素有许多，归纳起来，完善质量指标体系应该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依据人们需求的精准化、精细化的要求而修订标准。二是通过有效需求的适应性和消费者的满意度而升级标准。三是通过判定高质量发展的最佳状态而校正标准。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供给与需求在数量上相等，在质量上平衡，才是最理想的发展状态，也是经济资源配置最有效、最合理的状态。

解决行业认证需要与认证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为我国一些行业发展突破了前沿技术，但缺乏技术规范、技术标准以及国内独立的认证机构和技术队伍。我国质量体系认证是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认可并授权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秉承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依据国家“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系列标准进行审核确认，颁发标志和证书，证明其质量体系和质量保证能力相符合的行为。目前，一些国际权威

认证机构如英国、美国、欧盟、日本等，纷纷在我国设立第三方认证机构或成立办事处。相比较于发达国家，我国技术认证开展时间较晚，企业和产业的认证数量、认证机构、认证标准明显滞后。如美国有55种认证体系，日本有25种认证体系，欧盟内部有9种统一的认证体系，而我国尚未形成统一认证体系。

近年来我国每年约有27%对美出口额受到其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每年被美国海关扣留的食品批次中25%并非质量不良，而是因为标签或包装不符合美国食品标签法的规定而被销毁或退货。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制定了较多严格的技术标准和法规。如欧盟拥有10万多种技术标准，德国工业标准有1.5万种，日本有工业标准8000种和农业标准400种。因此，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我国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第三方认证机构。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考察，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到工业化中后期时，往往都会把提高产业体系质量上升为国家战略，出台提升质量的相关政策法律。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为此，2014年9月，我国召开中国质量大会，提出了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以质量的提升“冲抵”速度的放缓，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质量时代”。党的十九大又一次指出，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足以体现党和国家对质量的重视。

随着我国行业领先与专利技术的增加，我国已经拥有了许多国际领先的科技前沿技术，如高铁、港珠澳跨海大桥等，建立相应的技术标准，组建认证机构和认证队伍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借鉴国际经验和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的新要求，尽快制定出台我国质量促进办法，按照以法治标，明确政府与市场各自应该担负起推动产业、行业、部门开展高标准指标体系建设的责任使命，各司其职，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

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以产业兴旺

□ 李江涛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产业兴旺是“首位”“基础”和“牛鼻子”。之所以在乡村振兴的20字总要求中，把“产业兴旺”放在第一位，是因为长期以来除粮食生产能力等得以有效提升外，农业及其延伸产业在总体上并未出现基本的“兴旺”态势，反而呈现出某种“式微”现象，成为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制约因素。

农业发展面临瓶颈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没有得到有效构建。我国农业产业体系中，一些重要农产品如大豆、多功能产业体系如休闲农业，以及现代农业支撑产业体系如农业科技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流通体系等，不同程度上都出现了结构性不平衡的现象。

农业绿色化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当前我国农业仍然主要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方式，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态退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遏制，绿色农产品比例大都远低于国际水平，农业绿色化发展模式尚未真正建立。

农业产业集群没有发挥出预期效应。农业产业集群是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虽然我国已经建设了5286个农业标准化示范区、309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1991个省级农业开发区，但有些示范区或开发区本身的集群效应仍然偏低，无论其产出规模，还是其品质表现，都难以支撑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仍然偏弱。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依靠农业科技能力来提升农产品生产能力和绿色化能力，包括农机设备、种业科技、肥料技术、农药技术、农业废弃物和农膜回收技术等等。

农业发展出现瓶颈的原因

农业较低的市场机制适应性，决定了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弱势地位，进而使农业发展问题具有了内生性。相

对于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较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空间较小。这就导致它对市场机制的适应性较差，导致行业平均利润率的低下，导致它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处于劣势。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大规模启动的情况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业生产力的释放表现得十分显著。但伴随工业化的深入开展，农业的劣势地位日渐明显，工农业及城乡差距在较长时期内呈现不断扩大趋势。

一系列主观因素的认知和引导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发展瓶颈问题的严重程度。第一，长期以来“经济赶超”成为我国主导性发展战略方针，政府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容忍度不断提高，使其调控工农业及城乡差距的动力不足，造成一系列的引导农业迈向现代化的政策体系难以落地生根。第二，农业人才严重匮乏。我国的农民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市场经济权利等领域缺乏充足的保障。大量农村、农业人才或“潜在”人才，在职业选择上“用脚投票”，“跳出农门”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产业间竞争，最终取决于人才竞争。人才的严重匮乏，势必造成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不完善。

产业兴旺的重要路径

持续性提升农业的行业平均利润率。要以“共享”“增量”“挖潜”等途径降低市场主体参与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的成本，增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吸引力。第一，有序推进新增耕地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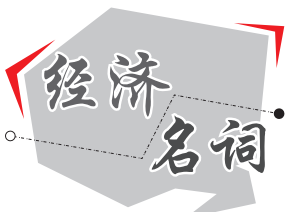
独角兽企业

品或新颖的商业模式，颠覆了传统产业模式，成为引领产业变革的先锋和产业的新核心。它们具有传统行业的颠覆者、新兴技术的开拓者、新经济的引领者等特点。一是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创造新需求，其产品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二是技术创新催生若干独角兽，2010年代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000年代的脸书、1990年代的谷歌、1980年代的思科、1970年代的微软、1960年代的英特尔，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三是对于新经济及创新发展具有引领作用，是区域科技创新的推动者。

独角兽企业已成为所在领域潜在价值的掘金者，不仅得到了用户的青

睐，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因此，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得支撑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资源。独角兽企业的诞生，不仅成为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标杆，也让很多投资机构通过资本退出获得大量收益。可以说，发现一个潜在的独角兽企业，无论对于产业界还是资本方，都具备相当大的意义和价值。

综合相关榜单，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独角兽企业共有126家，分布在10个城市15个行业，总估值6253亿美元，约4万亿人民币，其中超级独角兽即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有11家，占比8.66%。相比较于2014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榜单，2014年至2018年，我国独角兽



独角兽企业是投资行业的术语，特指那些爆发式增长、稀少、被投资者所“热捧”的创业企业，其衡量标准是创业10年左右，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如果企业估值超过100亿美元，则被称为“超级独角兽”。

独角兽企业以突破性的技术产